

# 愛深責切的民族情感—— 論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黎愼 在《南風雜誌》上的文史書寫\*

羅景文\*\*

〔摘要〕

越南知識人黎愼（Lê Du，1885？-1957，別號「楚狂」）曾有著與反法殖民運動者相似的知識接收過程和抵殖民經驗，後來卻又被法殖民政府所吸收。在出洋的過程中，他的活動足跡遍及中、日、韓、東南亞等地，形成特殊的東亞流動性體驗。相較於政治活動，黎愼更熱衷於文史研究與區域考察。他在返越之後，成為《南風雜誌》漢文版的主要撰稿人，也陸續於越文版發表文章，更於1924年進入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簡稱EFEO）任職，得以展開更深入的越南文史研究。黎愼努力挖掘越南文史中隱而不顯，或是被抹除消音的歷史角落與邊緣人物。他的文史書寫，充滿著絲毫不遜於反法殖民運動者之熱烈深厚的民族情感，我們顯然不能用傳統「效忠」與否的二元觀點來看待他。反而，可以藉此思考這類經歷不同立場選擇之知識人，在書寫背後更複雜多元的情感意圖和行動抉擇。

關鍵詞：越南知識人、黎愼、楚狂、《南風雜誌》

---

\* 本文為科技部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殖民處境與東亞流動下的選擇性書寫——越南知識人黎愼在《南風雜誌》上的文史研究與區域考察」（MOST 105-2410-H-110-068）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本文曾宣讀於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與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所屬漢喃研究院主辦、中正大學歷史系協辦之「第二屆文獻與進路：越南漢學工作坊」，2017年10月20日，承蒙講評人漢喃研究院阮氏鶯（Nguyễn Thị Oanh）教授指正，復蒙《文與哲》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使本文論點與內容能更為周全，深表感謝。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1905年，越南近代著名的反法殖民運動者暨知識人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1867-1940）曾前往日本尋求支持抗法的資源，之後他多次往來日本、中國，進行革命工作，一方面祕密聯繫國內反法分子，同時也組織青年學生赴日本留學，史稱「東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其中有一位名叫「黎愷」（Lê Dư，1885？-1957）的年輕人受其感召，前往日本苦學，卻在日後背叛組織，而被潘佩珠等人視為叛徒。

黎愷，本名黎登愷（Lê Đăng Dư），別號「楚狂」（Sở Cuồng），約在1885年生於越南廣南省奠盤縣農山社，從小接受漢學教育，稍長則與同為越南近現代重要知識人的潘魁（Phan Khôi，1887-1959）、阮伯卓（Nguyễn Bá Trác，1881-1945）等人在河內學習法語。1906年，黎愷前往日本參與潘佩珠所領導的東遊運動，該運動不斷受到來自法殖民政府的逼迫和壓力。1907年6月，日法兩國締結「日法協約」，法方能透過日本的協助，驅逐這些在日反法運動者與留學生。東遊運動瓦解之後，黎愷便前往中國、朝鮮遊學，並在旅行遊歷的過程考察各國歷史、文化及制度。然而，研究者對於黎愷參加東遊運動與他在日本之生活情形，以及該運動瓦解之後，他是否滯留日本，日後又在那些地方遊學遊歷，所知不多。黎愷雖著有不少遊記或是采風報告，但他自己甚少提及自身之生活狀況。這或許是因為他曾被法殖民政府所吸收，並勸說潘佩珠提出「法越提攜」論（Pháp Việt Đề Huề），故而低調或是不願提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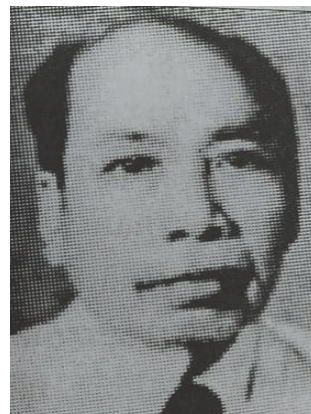


圖1、黎愷像<sup>1</sup>

被囚禁在廣州的潘佩珠，於1917年3月（陰曆）出獄後，想要趁著歐戰爆發的機會進行革命運動，為了尋求行動上的支援，他便與此時已經投法的黎愷和潘伯玉（Phan Bá Ngọc，約1882-1922）兩人有密切的聯繫。根據潘佩珠的回憶，是黎愷先向他提到印度支那總督沙露（Albert-Pierre Sarraut，1872-1962）有較為開明且和緩的殖民政策，他勸潘佩珠為文提倡法越兩方相互合作提攜。日後又由潘伯

<sup>1</sup> 圖片來源：〔越〕陳孟常（Trần Mạnh Thường）主編：《越南文學作家》（Các Tác Giả Văn Chương Việt Nam）第1冊（河內：洪德出版社，2015年），頁877。

玉再三鼓動，潘佩珠遂改變以往堅持的反法殖民立場，約於 1918 年前半年寫出〈法越提攜政見書〉，此論一出，正中法殖民政府的下懷，造成抗法運動團體內部的混亂，也削弱了反法的民族意識。<sup>2</sup>

黎慎於 1919 年返回越南後，加入《南風雜誌》（*Nam Phong Tạp Chí*），接替 1919 年 5 月被命為光祿寺卿的阮伯卓，以「楚狂」為筆名，發表多篇作品，成為漢文版的重要撰作者。後於 1924 年任職於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簡稱 EFEO，越語為 *Học Viện Viễn Đông Bác Cổ*，漢譯為「遠東博古學院」）。此時他也致力於越南文史的研究，並改於《南風雜誌》越文版上發表論著，日後更出版《南國女流》（*Nam Quốc Nữ Lưu*，1929 年）、《女流文學史》（*Nữ Lưu Văn Học Sử*，1929 年）、《白雲庵詩文集》（*Bạch Vân Am Thi Văn Tập*，1930 年）、《渭川詩文集》（*Vị Xuyên Thi Văn Tập*，1931 年）、《普昭禪師詩文集》（*Phổ Chiêu Thiền Sư Thi Văn Tập*，1932 年）等越文著作，展現了他在文史資料蒐集與編錄文獻上的專業。<sup>3</sup>1945 年胡志明（*Hồ Chí Minh*，1890-1969）

<sup>2</sup> 潘佩珠在其自傳《潘佩珠年表》（*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提到：「戊午年（1918）正月，黎（筆者按：即為黎慎）從內出，會予於杭州，『法越提攜』四字之名詞入予耳者，此為第一次。彼以為沙露全權之政策與向來諸全權不同。黎又云：『沙露社會黨人，社會主義與法國殖民政策大相矛盾。』黎又歷陳沙氏之種種政績，如立各學堂，改行北圻新律，許我人得結社立會如『開智進德會』云云。予初不甚信黎言，然念果如所言，則將計就計，未必無轉旋之餘地。予因謀於潘伯玉，是時予左右其共事多年，曾冒險多次，助予耳目成績頗多者，莫若伯玉。而此次黎出，尤與潘極意綢繆，潘提攜之熱已達極點，予之未覺也。潘之言曰：『欲成大事，不可無詭謀，今先生但作一理論之文，專言法越提攜之兩相有益。法人得書，必謂吾意已緩和，不專注於吾黨。吾可以遣人入內，與法人周旋，為吾黨之間諜。法人之情狀，吾能窺知。國內之秘密，外人能知之。依黎君言，亦甚得策。』予信其言，謂彼決無背父叛國之理故也。爰著一篇文，名為『法越提攜政見書』，獨醒子撰。撰成，潘伯玉繕寫，文末署『潘伯玉奉書』，五字有譎意在也。黎攜此書南歸，又四五月而潘公廷逢之愛兒，居然為拳鬚翁之忠狗。」見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收錄於〔越〕章收（*Chương Thâu*）編輯：《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第 6 冊（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 年），頁 596-598。此亦可見黎慎與潘伯玉兩人之間合作勸誘潘佩珠的關係。

<sup>3</sup> 關於黎慎的生平，詳見〔越〕陳海燕（*Trần Hải Yến*）：〈黎慎〉，收入於〔越〕杜德曉（*Đỗ Đức Hiểu*）、阮慧芝（*Nguyễn Huệ Chi*）等主編：《文學辭典》（*Từ Điển Văn Học*）（河內：地球出版社，2004 年），頁 818-819。〔越〕瓠園（*Hồ Viên*）：〈前言〉，楚狂黎慎著、瓠園譯注：《昇龍印痕：河城今昔考》（*Dấu Tích Thăng Long : Hà Thành Kim Tích Khảo*）（河內：

正式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Việt Nam Dân Chủ Cộng Hòa），法國遠東學院也進入新的階段，胡志明政府為此設置了一個顧問委員會，黎愼即為該委員會成員之一，可以獲得該學院的補助，進行相關研究工作。<sup>4</sup>

歷來關於黎愼及其文史著作的研究並不多，但大致可分為以下二類：首先，是關於黎愼生平及作品之譯介，這類資料主要見於工具書的辭條，或是譯介作品的「前言」之中，如上述陳孟常主編的《越南文學作家》中的「黎愼」條便是如此。<sup>5</sup>又如學者陳海燕為越南著名的《文學辭典》所撰之〈黎愼〉辭條，陳氏認為黎愼非常擅於蒐集整理被人們所忽略的文獻史料，為後世越南文史研究提供更多材料，雖然不免有些考證上的錯誤，但其發掘與維護越南先人之資產的用心是有珍貴價值的。<sup>6</sup>再如瓠園在譯注黎愼〈遊古螺城記所感〉、〈河城今昔考〉時所撰之〈前言〉，他除了介紹黎愼生平和主要作品之外，也說明〈遊古螺城記所感〉及〈河城今昔考〉的內容及特色。<sup>7</sup>在目前學界討論不多的狀況下，這些既有成果對於我們初步了解黎愼的生平事蹟，有其重要性。

其次，說明黎愼在東亞交流史研究上的成果與貢獻，例如段黎江、黎光長〈楚狂黎愼：研究越日關係的先鋒者〉一文，他們認為黎愼以介紹日本地理、歷史、語言、文學、教育制度、國民性、越日往來關係為主的〈列國采風記〉、〈古代南日交通考〉、〈古代我們與日本交通之交通〉等著作，是越南最早關注「越日」外交關係的論著，蒐集整理了相當豐富的史料，對於日本之文化、制度和國民性亦有深刻的觀察，因此可說他是越南人中研究越日關係的第一人。<sup>8</sup>又如韓國學者

---

勞動出版社，2007年），頁5-10。

<sup>4</sup> [越]吳世隆（Ngô Thế Long）、陳太平（Trần Thái Bình）：《遠東博古學院（1898-1957）》（*Học Viện Viễn Đông Bác Cổ (Giai đoạn 1898-1957)*）（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98、100。

<sup>5</sup> 陳孟常主編：《越南文學作家》第1冊，頁877-878。

<sup>6</sup> 陳海燕：〈黎愼〉，頁818-819。

<sup>7</sup> 瓠園：〈前言〉，頁5-10。

<sup>8</sup> 詳見[越]段黎江、黎光長（Đoàn Lê Giang, Lê Quang Trường）：〈楚狂黎愼：研究日越關係的先鋒者〉（“Sở Củng Lê Dư - Học Giả Tiên Phong trong Việc Nghiên Cứu Quan Hệ Việt Nam-Nhật Bản”），越南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Tạp chí Văn học*），第7期（2014年），頁66-78。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段氏提到黎愼這些論著是用漢文寫成，不易為人所關注。所以，他用較多篇幅來翻譯介紹黎愼考察日本文化制度及兩國往來史料的成果，尤其詳於黎愼所記錄的日本教育制度。段氏另有一篇〈《外蕃通書》：越日關

尹大榮的〈1930-40 年代の金永鍵とベトナム研究〉一文，此文約略述及金永鍵（1910-1998？）與黎愼兩人在學術上的往來互動。黎愼曾以他關注到日本的「白濱顯貴」，以及原為越南李朝王子，因躲避陳朝追殺，而至高麗的「李龍祥」（Lý Long Tường, 1174-？）的事蹟，來與金永鍵進行學術上的討論，相互激勵並進而深化彼此的研究成果。<sup>9</sup>黎愼所關注的不僅是越日關係，也進一步擴展到越韓關係。

有意思的是，像黎愼這種傾法／親法的越南知識人，既具有高度的跨國流動經驗，又能進行跨語際的研究及書寫，對於蒐集文獻、考掘真相、顯微闡幽、重建越南文史傳統而用力甚深的學者，我們卻連他在法國遠東學院擔任過什麼職務，負責什麼工作，任職時間長短都不是很清楚，只能透過時人或是同事的簡短記錄，來推測他大致的職務和工作內容。1932年5月，來自韓國的金永鍵取代了黎愼，成為遠東學院圖書館日文圖書室的助理圖書館員（bibliothécaire-adjoint），負責管理日、韓資料。<sup>10</sup>我們藉此可以了解黎愼先前應該是擔任助理圖書館員的工作，但當金永鍵接替他的職務之後，他又負責什麼工作呢？我們再透過著名越南史學者陳荊和（1917-1995）的記錄來略窺一斑，陳氏大學甫畢業即爭取至河內法國遠東學院交換留學的機會，後來在他〈戰時的法國遠東學院〉這篇短文裡，介紹了他旅越時期（1943-1946）該院的概況與相關研究人員，其中他提到了該院內的越南學者有阮文暄（Nguyễn Văn Huyền, 1905-1975）、陳文理（Trần Văn Giáp, 1902-1973）、阮文寬（Nguyễn Văn Khoan, 1890-1975）、黎愼、阮文素（Nguyễn

---

係的古代史料〉（“*Ngoại Phiên Thông Thư: Tập Tư Liệu Cổ về Quan Hệ Việt Nam-Nhật Bản*”），也運用了不少黎愼整理的資料，載於《科學和工藝發展雜誌》（*Tạp Chí Phát Triển Khoa Học và Công Nghệ*），第17卷第12期（2014年），頁112-125。又如グエン・テイ・オワイン（Nguyễn Thị Oanh, 阮氏鶯）〈越日外交關係を古書籍に探る〉一文亦提及黎愼進行越日研究的成果，並想在未來將黎愼這些成果翻譯為越文，此文收入於劉建輝編：《日越交流における歴史、社会、文化の諸課題》（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5年3月），頁25-44，與黎愼有關之內容，詳見頁34-35。

<sup>9</sup> [韓] 尹大榮著，李美智譯：〈1930-40 年代の金永鍵とベトナム研究〉，《東南アジア研究》第48卷第3號（2010年12月），頁326、330。

<sup>10</sup> 同前註，頁317-318。金永鍵於1936年4月升任為日本圖書室主任。關於金永鍵之研究成果的學術史討論，亦可參見陳瑋芬：〈金永鍵之日本與東南亞交流史論——《印度支那與日本的關係》述評〉，收入於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越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年11月），頁179-235。

Văn Tồ, 1889-1947) 等人。<sup>11</sup>不過, 陳荊和也說到: 「這三位(筆者按: 上述後三者)本來是越南有數(筆者按: 原文如此)的漢學家, 但只因其方法較老, 多年來都只能甘於『研究助手』的地位。」又云: 「日本投降以後, 成立了越盟獨立政府, 那時學院也被這些越南學者接收, 首先是黎愼任院長, 但後來讓給了阮文暄氏, 阮氏同時兼任東法大學的校長。」<sup>12</sup>藉由陳荊和的記錄, 我們可以了解黎愼與其他越南漢學家都曾任職於法國遠東學院, 受限於學歷及學術訓練, 未能成為正式的研究員, 但黎愼曾短暫地擔任該院院長。若相較於那些同樣任職於法國遠東學院而蜚聲國際的漢學家來說, 黎愼所獲得的關注不啻有天壤之別。<sup>13</sup>更不用說黎愼的文史書寫與研究猶待進一步的開展。

因此, 本文先試著介紹黎愼在《南風雜誌》上所發表之文史著作, 並歸納其主題類型, 以增進學界對這位越南知識人的認識, 並作為後續討論之用。其次, 進一步討論黎愼在《南風雜誌》上發表之文史書寫的特色, 即他如何面對現實中被殖民的困頓處境, 尋求越南歷史上的光榮時刻, 來表達他對國家民族的熾熱情感, 以及他對國族的想像。相信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 將有助於了解像黎愼這樣近現代越南知識人豐富的生命歷程與精神面貌。

## 二、黎愼在《南風雜誌》上發表之文史著作的概況

前文提及黎愼曾以「楚狂」為筆名, 1920年之後在《南風雜誌》漢文版上發表多篇作品。1924年, 黎愼雖任職於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 但仍繼續為《南風雜

<sup>11</sup> 陳荊和:〈戰時的法國遠東學院〉,《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3期(1949年5月),第4版(原頁碼標示如此)。

<sup>12</sup> 同前註。但筆者目前尚未見到其他關於黎愼擔任法國遠東學院院長的資料。

<sup>13</sup> 以幾部回顧法國遠東學院百年來發展的著作為例, 如 Philippe Le Failler:《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 1900-2000: 回顧一世紀來的科學研究》(*Viện Viễn Đông Bác Cổ Pháp tại Việt Nam, 1900-2000: Nhìn Lại Một Thế Kỷ Nghiên Cứu Khoa Học*) (河內: 文化通信出版社, 2000年, 此書為法越雙語對照), 又如 Clémentin-Ojha, Catherine. Manguin, Pierre-Yves.: *A Century in Asia: The History of the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898-2006* (《在亞洲一世紀: 法國遠東學院史 1898-2006》)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7)。以上兩書都未提到黎愼及其文史研究, 僅有上文註4所引之吳世隆、陳太平所著之《遠東博古學院(1898-1957)》簡略提及黎愼是位「作家, 漢喃研究專家」(“nhà văn, nhà nghiên cứu Hán-Nôm”), 見頁100。

誌》漢文版供稿，直到 107 期（1926 年 7 月）。<sup>14</sup>之後他出版數部越南文史著作，如《南國女流》（1929 年）、《女流文學史》（1929 年）、《白雲庵詩文集》（1930 年）、《渭川詩文集》（1931 年）。1931 年 6 月之後，黎愼改在《南風雜誌》越文版上發表作品。為方便討論，筆者先將黎愼在《南風雜誌》漢、越文版上所發表之相關篇目整理為以下二表：

表一：黎愼（楚狂）發表於《南風雜誌》漢文版之著作目錄表

序號	題目	卷期時間
1	列國采風記	第 41-43、45 期(1920 年 11 月-1921 年 1 月、3 月)
2	西湖覽古	第 44-46 期(1921 年 2-4 月)
3	暹京旅次見聞記	第 48-50 期(1921 年 6-8 月)
4	香港行政談	第 50 期(1921 年 8 月)
5	高綿考古	第 51 期(1921 年 9 月)

<sup>14</sup> 黎愼為何在 107 期之後，未繼續在《南風雜誌》漢文版上發表作品？其中一項原因可能是與漢文地位降低、縮減漢文版版面之編輯策略有關，陳慶浩先生曾提到：「隨著殖民地文化政策的推展，漢文日漸息微，失去了傳統的地位。新一代接受的是越文和法文教育，已漸漸不懂漢文。又隨著越文的普及和日趨成熟，老一輩知識分子，即便不能書寫越文，亦能閱讀，通過漢文來傳達和宣傳殖民地政策，已愈來愈不重要了，《南風雜誌》的漢文版版面逐漸減縮，與此同時，越文版日漸加強，又慢慢添了法文版。《南風雜誌》正反映了越南從使用漢文到以越文取代漢文的歷史。……到後期，漢文每期只得一二十頁，除了偶爾報導阮朝事務外，多是轉刊舊文，已少有新的創作了。最後二十期雜誌，大部分已沒有漢文版了。」見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收入於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2-3。黎愼後來未再在漢文版，而是改於越文版發表作品，亦顯示了漢文越文版面的消長情形。

序號	題目	卷期時間
6	古代南日交通考	第 54 期 (1921 年 12 月)
7	古代我國與日本之交通 (續)	第 56 期 (1922 年 2 月)
8	文苑江戶竹枝詞	第 56 期 (1922 年 2 月)
9	粵東風土記	第 57-61 期 (1922 年 3-7 月)
10	越南光榮之歷史	第 58 期 (1922 年 4 月)
11	開智進德之主義急宜見諸寔行	第 60 期 (1922 年 6 月)
12	對於越南青年會之感想	第 63 期 (1922 年 9 月)
13	萬里長城巡遊記	第 63、72 期 (1922 年 9 月、1923 年 6 月)
14	新聞家之事業	第 64 期 (1922 年 10 月)
15	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	第 67 期 (1923 年 1 月)
16	體育學校前途之發達	第 68 期 (1923 年 2 月)
17	遊古螺城記所感	第 68 期 (1923 年 2 月)
18	日本風俗志	第 71-72 期 (1923 年 5-6 月)
19	文苑江戶旅中懷友人	第 72 期 (1923 年 6 月)



序號	題目	卷期時間
20	孟子學說	第 76 期 (1923 年 10 月)
21	墨學概論	第 77 期 (1923 年 11 月)
22	王陽明學說及其略傳	第 79 期 (1924 年 1 月)
23	河城今昔考	第 80-81 期 (1924 年 2-3 月)
24	本朝前代與明末義士關係之逸事	第 81 期 (1924 年 3 月)
25	編輯中有感	第 84 期 (1924 年 6 月)
26	萬里遠征記	第 84、87-89、91-92 期 (1924 年 6 月、9-11 月、1925 年 1-2 月)
27	安南人種之起源	第 85 期 (1924 年 7 月)
28	阮攸論	第 86 期 (1924 年 8 月)
29	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	第 88-89 期 (1924 年 10-11 月)
30	記吳越遺事	第 89 期 (1924 年 11 月)
31	現今世界民治之趨勢	第 90 期 (1924 年 12 月)
32	西山史論	第 93 期 (1925 年 3 月)
33	阮有整論	第 94 期 (1925 年 4 月)

序號	題目	卷期時間
34	讀《安南志略》書後	第 95 期（1925 年 5 月）
35	陳朝平元之武功	第 96 期（1925 年 6 月）
36	明末義士魏九官逸事之研究	第 96 期（1925 年 6 月）
37	《越文講義》新出版	第 96 期（1925 年 6 月）
38	聞申相公訃音有感	第 97 期（1925 年 7 月）
39	陳黎演義	第 98-99 期（1925 年 8-9 月）
40	裁省南朝職員擴充議院權限之意見書	第 102 期（1926 年 2 月）
41	裴家志士略傳	第 103 期（1926 年 3 月）
42	鄭王史論	第 104 期（1926 年 4 月）
43	研究史學之概要	第 106 期（1926 年 6 月）
44	對於中圻人民代表院選舉後所感	第 107 期（1926 年 7 月）

表二：黎愾（楚狂）發表於《南風雜誌》越文版之著作目錄表

序號	題目	卷期時間
1	草澤英雄（Thảo Trạch Anh Hùng）	第 163-166 期（1931 年 6-10 月）
2	忠義者之死 （Cái Chết của Người Trung Nghĩa）	第 168 期（1932 年 1 月）
3	鵬郡公史 （Lịch Sử Bằng Quận Công）	第 170 期（1932 年 3 月）
4	喃字與國語 （Chữ Nôm với Chữ Quốc Ngữ）	第 172 期（1932 年 5 月）
5	國音詩文叢話 （Quốc Âm Thi Văn Tùng Thoại）	第 173、175-180 期（1932 年 6 月、 1932 年 8 月-1933 年 1 月）
6	古今逸史 （Cổ Kim Dật Sử）	第 188-189、192 期（1933 年 9-10 月、1934 年 1 月）
7	對於人生的新觀念 （Một Quan Niệm Mới về Đời Người）	第 189 期（1933 年 10 月）
8	我國文學起源與新文學 （Nguồn Gốc Văn Học Nước Nhà và Nền Văn Học Mới）	第 190 期（1933 年 11 月）
9	歌舞與我國音樂 （Ca Vũ và Âm Nhạc Nước Nhà）	第 193 期（1934 年 2-3 月合刊）
10	佛教要論（Phật Giáo Yếu Luận）	第 195 期（1934 年 5 月）

綜合黎愼發表在《南風雜誌》漢、越文版的作品，其書寫主題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類：

一是黎愼對越南文史的考究，或挖掘歷史隱微之處，或反思既有之歷史書寫，或關注歷史中的無名英雄與底層人物。例如〈西山史論〉便是省思越南傳統官方的歷史書寫，黎愼認為若非西山阮氏的抵抗，越南早已遭中國清兵鐵蹄蹂躪，西山朝實「為我歷史上最具有價值之時代」。但由於西山阮氏後敗於阮朝開國國君嘉隆帝阮福映(Nguyễn Phúc Ánh, 1762-1820)，《大南實錄》便將阮岳(Nguyễn Nhạc, ?-1793)、阮惠(Nguyễn Huệ, 1753-1792)等人所建立的西山朝視為「偽西」，故黎愼有此不平之論。另一篇〈鄭王史論〉亦有類似的歷史反思。出自於對歷史幽微處的關注，黎愼亦多注目於民間起義者及加入其陣營之文士，或是在時局紛亂中有複雜的政治認同者，例如他在越文版《南風雜誌》上所發表的〈草澤英雄〉一文，便是向歷史上的「狂顛英雄」(Khùng Diên Anh Hùng)再三致意，黎愼所描寫的這些歷史人物在阮朝朝廷眼中，他們屬於叛亂份子，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他們卻是人民心中的英雄。<sup>15</sup>黎愼也留心於河內及鄰近地區之地方史的建構，分別撰有〈河內今昔考〉、〈遊古螺城記所感〉兩文，在他的眼中河內是一座充滿活力的「鬧熱新都市」，卻也是「古跡名勝，歷歷可數」之「歷代帝王都所在」，在新舊今昔交疊之中，歷史的流動感於焉產生。他不僅「書寫歷史」，考察過去歷史之變遷，也「參與歷史」，記錄當下所聞所見所感，甚至繪出不同時期的河內城圖，以明變化發展之跡，如下圖二、三所示：

<sup>15</sup> 詳見楚狂：〈草澤英雄〉(“Thảo Trạch Anh Hùng”)，《南風雜誌》越文版，第163期(1931年6月)，頁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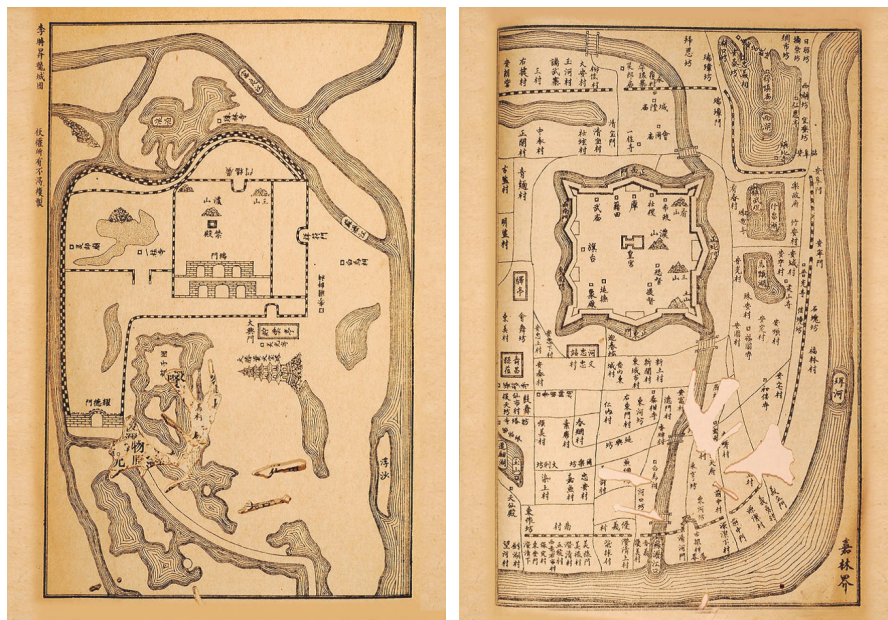


圖 2、圖 3：李朝昇龍城圖、嗣德時代河內城圖<sup>16</sup>

二是黎愼對於東亞關係史研究及相關區域之考察，這類著作多以遊記、風土記錄，或是史料輯錄的方式呈現，例如一共刊載六期的〈萬里遠征記〉便在卷頭預告，作者有遊歷中日韓三地之舉，可惜文章未完，讀者只能見到作者行至北京便戛然而止。<sup>17</sup>然而，作者似乎又另起爐灶，再撰新篇，細加描述遊歷某些地區的過程及其所得，如〈西湖覽古〉、〈香港行政談〉、〈萬里長城巡遊記〉。此外，黎愼亦將行旅的足跡擴展至高綿和暹羅，並撰有〈暹京旅次見聞錄〉、〈高綿考古〉等文。有些作品雖非遊記，偏向導覽特色或資訊介紹，卻能讓人有一篇在手，馬上掌握一地之風土民情、制度文化的便利性，例如偏重介紹日本國之各項制度、

<sup>16</sup> 圖 2、3 來源：楚狂：〈河內今昔考〉，《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1 期（1924 年 3 月），附圖，無頁碼。

<sup>17</sup> 作者於〈萬里遠征記〉一開始，便列出他此次遠遊所經之地：「香港、神戶、東京、橫濱、京都、大阪、門司、長崎、釜山、漢城、平壤、鴨綠江、奉天、長春、哈爾濱、山海關、天津、北京、曲阜、黃河、泰山、浦口、揚子江、南京、蘇州、上海、杭州」。見楚狂：〈萬里遠征記〉，《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4 期（1924 年 6 月），頁 1。

文化、國民性的〈列國采風記〉、〈日本風俗志〉，以及記錄廣東一帶民情風俗的〈粵東風土記〉。文中內容大多是來自於他自身的親身經歷、實地觀察、深刻體驗、甚至是來自與他人的訪談互動。又如〈古代南日交通考〉、〈古代我國與日本之交通〉這兩篇篇名雖異，實則一貫的作品，是黎愼自日本史籍中輯錄越日兩國外交文書，並將其分為三個部分：「本朝先代日本交通之文書」、「黎朝與日本交通之文書」、「鄭氏與日本交通之文書」，共收錄了三十五篇越南日本兩國往來互致之文書。黎愼除了引錄書信原文之外，也查考相關史料，進一步說明事件經過或考證事件人物身份，從而開啟了新的學術議題。<sup>18</sup>在〈古代南日交通考〉之後，黎愼又發表了〈本朝前代與明末義士關係之逸事〉、〈明末義士魏九官逸事之研究〉二文，考察了明末為避戰亂，而往返於安南及長崎之間進行貿易的魏之琰（1617-1689）的相關事蹟，以證明東亞海域和中日越三國早已透過貿易而有密切的互動。<sup>19</sup>從黎愼的東亞遊記、區域考察、風土記錄，以及相關交流史料之蒐集整理來看，已經形成東亞視域中非常特殊的流動經驗，讓他可以在近現代東亞各國各區域的往來互動中，進行跨越地域文化的探索與省思。

三是黎愼針對政局時事發表意見，或觀察制度改革後所產生的新問題與解決之道，又或是介紹某些機關或組織之特色，如〈開智進德之主義急宜見諸寔行〉、〈對於越南青年會之感想〉、〈體育學校前途之發達〉等三篇文章，便認為當時成立之開智進德會、越南青年會可補教育之缺，有助於開啟民智，而體育學校的

<sup>18</sup> 例如黎愼曾將弘定二年（慶長六年，1601年）的〈照尊孝文皇帝寄日本德川家康氏書〉與《大南實錄》前編相互對照，他發現1585年（日本天正十三年）來越南劫掠的「西洋國賊帥，號顯貴者」，即為此信所提的日本人「白濱顯貴」，見楚狂：〈古代南日交通考〉，《南風雜誌》漢文版，第54期（1921年12月），頁201。日後他曾與金永健討論此事，金永健則透過更細緻的史料分析討論這位號「顯貴」的西洋國賊帥，他認為是日人白濱顯貴的可能性很高。詳見金永健：〈安南の史料に現れたる顯貴の名に就いて〉，收入於氏著：《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關係》（東京：富山房，1943年3月），頁255-262。

<sup>19</sup> 魏之琰，字雙侯，號爾潛，人稱魏九官。魏九官後入日本籍，以郡名鉅鹿為姓，成為長崎唐通事。他在旅居安南時，曾娶安南女子武氏暄（1636-1698）為妻，生二子永時、永昭，二子後隨其父至日本居住，獨留武氏於安南。武氏見夫及二子遠別，無復有團圓希望，遂轉嫁黎姓，而生一子黎廷相，一女黎氏琮。後魏氏與黎氏兄弟因其母喪及遷葬事而以書札相往。詳見楚狂：〈本朝前代與明末義士關係之逸事〉、〈明末義士魏九官逸事之研究〉，《南風雜誌》漢文版，第81、96期（1924年3月、1925年6月），頁47-49、92-93。

開辦，更能鍛鍊越南人身心，達到強國強種的目的。至於〈現今世界民治之趨勢〉、〈裁省南朝職員擴充議院權限之意見書〉、〈對於中圻人民代表院選舉後所感〉等文，則呼籲刪減阮朝職員員額，增加議院議員之員額，擴大國民參與政治的機會，以求真正之民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黎慎曾發表一篇〈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介紹他所任職之法國遠東學院的設立沿革、人事組織、圖書館、博物館、學術出版品等之概況，最後申說法國遠東學院對於保存越南文化的重要意義。雖然黎慎並未提及他的職務與工作概況，但透過他的第一手報導，我們可一窺 1920 年代法國遠東學院的發展狀態。

四是黎慎引介或評論中國思想文化，這類作品如〈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孟子學說〉、〈墨學概論〉、〈王陽明學說及其略傳〉等文。在介紹諸位思想家之學說大要外，黎慎更從正面的態度肯定這些中國傳統思想，並與當代局勢對應，試圖找出這些傳統思想的當代價值。例如黎慎透過〈孟子學說〉一文，回顧西方世界因歐戰爆發而導致的破敗，他寫到：「物質文明發達的現代，歐洲大戰與之以當頭一棒喝，大則亡人之國、喪人之家，小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淒涼悲慘，萬象悉呈，憔悴瘡痍，百年難復。一時識者大有厭此時勢，欲返而求之於精神的趨嚮。」他認為可以用東方的精神文明來拯救，已經破產的西方文化，此時的孔孟所倡之倫理道德再也不是無法回應變局的糟粕，而是修補受損之精神心靈的良藥，重新肯定了孔孟學說與東方文化的價值。<sup>20</sup>

透過對越南知識人黎慎發表在《南風雜誌》漢、越文版之著作主題的歸納，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在《南風雜誌》上的文史研究與區域考察之作，並非遊戲筆墨式的書寫活動，而是在殖民處境與東亞流動下的特殊體驗與選擇性書寫，據此我們可思考黎慎在殖民處境、學術研究、民族情感和政治立場下的複雜思維與多重姿態。接下來，筆者將觀察黎慎如何書寫越南的現實處境、回顧越南的歷史榮光，以說明他對越南民族愛深責切的熱烈情感。

<sup>20</sup> 引文見楚狂：〈孟子學說〉，《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76 期（1923 年 10 月），頁 61。黎慎另於〈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一文中也提到：「（孔教）尤於世道人心有所補益，而毫無神怪眩感之事。泰西各國人亦公認孔教理想之高深，不敢有所瑕疵於其間也。我人得此粹美之教旨，果能身體力行，并輔之以新學見識而應之於用，則於我國政教前途，其文明進步寧可限量。」說明儒學之正面價值亦為西方人所肯定。見楚狂：〈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67 期（1923 年 1 月），頁 7-8。

### 三、擔憂與反省：越南民族在殖民處境下的衰弱與危機

自 1858 年法國逐步侵略，1884 年全面佔領越南，到 1940 年代改由日軍武力控制，淪為殖民地的越南不斷湧現反殖民運動。而除了政治和軍事行動上的作為之外，有志之士亦在書寫越南文史著作時，貫串了強烈的民族與反殖民意識。例如被譽為國族史學的開拓者——潘佩珠，<sup>21</sup>就曾著有《越南亡國史》<sup>22</sup>（1905）、《越南國史考》<sup>23</sup>（1909）、《重光心史》（約 1917-1918）等歷史著作及漢文小說，並為越南歷史上無論著名與否的英雄人物立傳。藉此「凝聚認同、激發種性、振興國魂」，以回應國族的危機，關懷著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與未來，進而達到越南歷史書寫的新境界。<sup>24</sup>潘佩珠的文史書寫是與其反法殖民運動密切相關的，那麼對於先後投入不同陣營的黎愼來說，他的越南文史書寫又呈現出什麼面貌？

先從黎愼傾法／親法行為來看，他曾為法殖民政府所吸收，積極拉攏以潘佩珠為主的反法殖民者與法方合作，而後又進入印支地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任職，這些舉動不免讓他遭受外在的質疑，並背負道德上的瑕疵和愧疚感。獻身較為單純的學術研究工作，或許能避免較多的指責。然而，帝國主義、殖民事業與學術研究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學者帶著先進的科學儀器和新式的知識架構，來探尋被殖民者的遺跡和古物，被殖民者的傳統資產也因此被納入在帝國權

<sup>21</sup> 如日本學者白石昌也曾提到潘佩珠是「ベトナム民族の歴史を振り返ることによつて、自分たち民族の現状を考察し、そして将来を展望しようとした最初の近代的ベトナム知識人であつた。ナショナリスト的歴史学は、彼によつてまず開拓されたのである。」見氏著：《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 年 2 月），頁 738-739。

<sup>22</sup> 如 David Marr 認為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是越南第一本訴求革命之史著，見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越南反殖民主義 1885-192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p114。

<sup>23</sup> 如越南學者胡雙（Hò Song）認為《越南國史考》則是越南首部書寫越南民族歷史發展之作，強烈的民族意識貫穿其中，詳見氏著：〈《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對越南史學的貢獻〉（“*Việt Nam Quốc Sử Khảo: Một Đóng Góp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ào Nền Sử Học Việt Nam*”），收入於章收編輯：《潘佩珠全集》，第 3 冊，頁 11-20。

<sup>24</sup> 潘佩珠試圖透過史學書寫，來為越南民族運動建構一套完整且可供運用的國族論述與英雄系譜，相關討論詳見羅景文：〈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成大中文學報》第 37 期（2012 年 6 月），頁 159-186。



力和殖民控制之下。在兩相對比之中，被殖民的越南人容易將法國與科學、進步和文明概念畫上等號，並感到自身文化之不足或是落後，逐步接受法國殖民之優越地位，從而影響到觀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不同角度。

黎慎在幾篇介紹官方機關、組織，或是針對時局發表意見的文章裡，的確有批評越南民族性低劣，讚揚殖民者及其機關或組織的言論。例如他在〈對於越南青年會之感想〉一文中提到：「竊嘆我越南處此廿世紀時代，各國科學之發達，文明之進步，已達於絕頂，而在我則茫茫然昏昏然，民智之低劣猶故也，學問之缺乏猶故也，豈非大可痛惜事。」教育正是啟迪民智、提升學問的好方法，但在缺乏普及教育的狀況下，「青年會」的成立可適時彌補這個缺口。<sup>25</sup>根據黎慎的描述，青年會的活動與設施豐富多元，<sup>26</sup>看來相當吸引人，與其民族智識低落缺乏的狀態形成強烈的對比，從而宣揚了殖民者美好形象。

另一個例子，是黎慎在〈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一文中，說到越南人缺乏保存文物及文化的觀念，其云：

我國始自鴻龐，而文郎、而甌貉，歷丁黎李陳以至今日，歷代繼興。其間民族之移住，人種之變化，江山一帶，蓋不知歷幾廢興。然每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古人雖云亡，而其所創造之事業多有不可泯沒者，惜我人嘗乏紀念的觀念，故對於古人所遺之典範之故物，非唯不能隨時注意保存，而且以私心毀壞之，使古人所留在人間之事業絕滅而後快。遂令前朝故殿，難覓殘釘；勝國舊宮，絕無碎瓦。無論數千年前之古，無復有存，即至近今百年黎鄭二氏歷代起在北河，為天下尊王，而有名的建築，已頹廢一空。<sup>27</sup>

<sup>25</sup> 引文見楚狂：〈對於越南青年會之感想〉，《南風雜誌》漢文版，第63期（1922年9月），頁63。他接著說：「此之時欲加以當頭棒喝、醒夢晨鐘，莫有急於鼓吹教育之一途。然求教育之普及，又非容易事，對於現時勢之要求，又莫先於施速成之教育以造成普通學問之人材。而欲施速成教育，則先以創立青年會為要。」同見頁63。

<sup>26</sup> 黎慎提到：「越南青年會之目的係為我越南在校學生及出校學生而設，凡年十七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皆可入會。會館內有住宿室、遊戲場、飲食堂、圖書館，及其有益智識的遊玩，如影戲、演說、體操、彈歌等。為我子弟造一最快樂最高尚最有趣致的公共家庭，最進益的最速成的教育場所。我青年之欣慰當何如矣。」見同前註。

<sup>27</sup> 楚狂：〈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續）〉，《南風雜誌》漢文版，第89期（1924年11月），頁85-86。

越南歷史發展有其長遠的時空脈絡，同時留下許多重要的文化資產，但也常隨著政治上改朝換代、成王敗寇，經濟上的追求開發、汰舊換新，以及氣候濕熱等因素，而難以獲得保存，或是保存狀況不盡理想。更重要是越南人對待自身之文化資產的態度，亦讓黎愼喟嘆不已，其云：「顧我國人，類多缺乏愛國思想，往往崇今賤古，知近忘遠，致我民族數千年來之事業，如烟散冰消。無論求之圖籍，散逸少存，即求之遺跡，亦頽廢殆盡，其可痛惜為何如者。」<sup>28</sup>黎愼正提醒著我們，若忽略歷史與文化記憶，也就失去了對自我、對國家民族的理解與認同，將成為「失根」的民族。而遠東博古學院（法國遠東學院）的成立，正好填補了這樣的空白，該院有目的、有系統、有計畫地進行東亞，尤其是東南亞文化的保存與研究，他提到「博古學院對於古昔所之遺址，留心稽究，設法保存，並由其所殘存之點，考一民族文化之盛衰，及美術技藝之優劣，發表於本學院雜誌，以公於世，其於我文化史上之貢獻無復有大於此也。」<sup>29</sup>文中雖盛讚博古學院的貢獻，但也不免有自身之文化寶藏只能透過外來者發掘研究，才能獲得比較妥善之保存維護的感嘆。

黎愼則在〈編輯中有感〉這篇文章中表達了他對越南人不重視報章，或是只想利用報章為己宣傳以攫取名聲的批評，他說：「我國人之對報章，其觀念又與各國異，其下流者之對於報章，則視為可有可無，不之留意。其上流者之對於報章，則欲其媚己，鋪張揚厲，以搏社會之虛名。否則視之如仇、惡之如敵，其感情不啻如冰炭之不相合。」<sup>30</sup>他認為此明顯有違報章媒體為公眾服務，追求「公是公非」的公正價值與社會責任，使報章最後成為「個人奴隸之機關」。<sup>31</sup>他另外舉了他閱讀日本報章的經驗，來說明日人勇於接受報刊上社論的批評，此舉有助於

<sup>28</sup> 楚狂：〈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8 期（1924 年 10 月），頁 61。

<sup>29</sup> 楚狂：〈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續）〉，頁 86。

<sup>30</sup> 楚狂：〈編輯中有感〉，《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4 期（1924 年 6 月），頁 99。

<sup>31</sup> 黎愼提到：「報章為指導國民之機關，傳播文明之利器，對於社會人群，有何等議論，亦本之公是公非。一字之褒，一字之貶，蓋非出於私意也。況隨國民之程度，順世界之潮流，乃報章所應盡之責任，編輯者又安敢一字一語，自作聰明，以亂人聽聞，而得罪於社會人群乎！今以閱者個人之私，必欲一切報章之媚己、尊戴之、贊揚之，記事者必須曲為回護，評論者必須為之恭惟，然後閱者之願始足乎。即此而論之，則報章乃個人奴隸之機關，豈社會人群之所以期望於報章者乎！豈閱者之所以期望於報章者乎！」〈編輯中有感〉，頁 100。

國民水準的提升，相較之下，越南仍缺乏這般文明國家的意識。<sup>32</sup>由此看來，黎慎在編輯《南風雜誌》，或是自身在發表言論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外在不小的干預或阻力，以致於他在文末情緒激動地寫下：「嗟乎！南風暗淡，筆墨無靈；長夜昏茫，夢魂未醒。報章亦何補於事，唯無之何若有之為愈。而我國人又以冷淡態度視之，殊令人難耐。嘵嘵數言，為是為非，自有閱者議論，在記者良心上只望其有所醒悟。」<sup>33</sup>而日漸暗淡的南風，或許正預告了《南風雜誌》漢文版日後走向緊縮的命運。

除了上述對於越南民族性某些面向的批評之外，現實中被侵略被殖民的難堪處境，更讓黎慎沉痛地寫下：

士氣奄奄，民風不振之今日，河山慘淡而無色，種族鄙劣之可羞，令外人有語及我國歷史及民族者，必鄙視之，侮蔑之，謂我民族為無血性民族，我歷史為無價值歷史，一若世界上可卑可鄙可賤可惡之人類無有甚於我越南人者。噫！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我國之至於如是之恥辱，吾人誠不可不思其故也。雖然，回頭往事，惓念古人，我民族我國威豈非亦曾有最轟烈最雄武之光榮歷史乎！而豈如今日也乎！<sup>34</sup>

黎慎用了許多負面的詞彙，來形容「越南」這個國家在被殖民的處境之下，所遭受的打擊和困局，簡直是難以翻身，甚至被外人形容為「無血性」之民族，「無價值」之歷史。既是如此無血性、無價值，殖民者便能輕易地抹除越南人的歷定好的一切。我們不難想見這樣的狀況，會帶給作者和越南人民多大的困窘與恥辱史記憶，隨意地蔑視他們、輕易地控制他們，使其歸順於殖民者所設。因此，黎慎呼籲國人應省思造成國勢衰微、慘遭殖民的原因，同時別忘記越南人也曾經有過「最轟烈」、「最雄武」的光榮時刻，回顧過去的恥辱挫折與燦爛輝煌，都是為了找出日後行動的方向，以指出更光明的未來。在歷史記憶的召喚中，得到民族更

<sup>32</sup> 其云：「余頃者東渡船中，在閱報客室見日本報登載華人張某攻擊日本國民論文一則。大書特書。非唯不曾責張某之攻擊，且又深贊其議論之正當，以促國民之覺悟。文明國人之從善如流有如此，視與我國人器度之不同何啻天淵之別也。宜乎文明者日進於文明，而我國民進化程度長此奄奄也。」〈編輯中有感〉，頁100。

<sup>33</sup> 楚狂：〈編輯中有感〉，頁101。

<sup>34</sup> 楚狂：〈陳朝平元之武功〉，《南風雜誌》漢文版，第96期（1925年6月），頁87。

新與前進的力量，換來更積極的行動意義。

#### 四、深情與期許：越南民族排外的屈辱與榮光

雖然黎愼在幾篇官方色彩較強的文章中，批評越南人的民族性，並宣揚了殖民者的政績。不過，若進一步觀察黎愼的文史研究與書寫，我們可以發現他在承認越南自身的衰弱與危機之外，同時也積極尋求與展示越南歷史之光榮及自信。因此，黎愼大聲疾呼越南亦有輝煌燦爛的歷史傳統，亟待人們追尋與召喚。他在許多文史著作中都有這樣的創作實踐，例如他在〈陳黎演義〉這篇講述因陳朝末年權臣胡季犛（Hò Quý Ly, 1336-?）篡奪皇位，導致內外局勢動盪，給予中國出兵滅胡佔領越南的機會（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中間經過後陳朝簡定帝陳頤（Trần Ngỗi, ?-1410）、重光帝陳季擴（Trần Quý Khoáng, ?-1414），以及後黎朝開國君主黎利（Lê Lợi, 1385-1433）等人的努力，最後得以成功抵抗中國明朝軍隊而獨立建國的歷史。其中又以「逋姑之戰」（Trận Bô Cô）最為激烈，逋姑（今南定省豐盈縣）為簡定帝大敗明朝沐晟（?-1439）和呂毅（?-1408）之地，是越南抗擊強敵大國（中國）的光榮戰役。黎愼是這麼描寫這場戰役的意義：

自明兵入寇，四出橫行，吾民苦痛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使非有陳肇基等唱義擁立簡定帝，以與明人抗衡，及鄧國公殺明官率眾響應，則我國民當時之受明人宰割者，將無所底止也。而鄧國公逋姑之戰，鏖殺明官及十餘萬眾，明人創巨痛深，為之少挫其蠻橫，尤為我國民最大痛快之事。與前此陳興道之驅逐元將脫驩，後此阮光中帝之大敗清將孫士毅，先後輝映，為歷史上之光榮，我國民所不可不知也。<sup>35</sup>

這場戰役嚴重打擊明軍士氣，是越南歷史上成功抗擊中國大軍的著名戰役，在黎愼筆下，直可與陳朝將領陳興道（Trần Hưng Đạo, 1228-1300）力退蒙古軍隊兩次入侵，西山朝光中帝阮惠大敗清軍等光榮事蹟相互輝映。這是越南民族以少勝多、以弱敵強、以寡擊眾而成功排外的輝煌記錄，是國族的自信與尊嚴，因此國人有記憶銘刻此一歷史榮光的必要，黎愼多次在他的史論中表達這個觀點，如〈陳朝

<sup>35</sup> 楚狂：〈陳黎演義〉，《南風雜誌》漢文版，第98期（1925年8月），頁25。

平元之武功〉一文便云：

我國只以驩愛以北兩廣以南之一彈丸黑子地，乃能與勢力無敵之蒙古種角勝敗，使鐘籛不移，金甌永奠。雖以忽必烈之雄，終莫之得志，豈非陳朝削平外敵之雄威所賜乎？其為我民族歷史之榮耀為何如耶？余故曰：「我民族不可不知此種歷史。知此種歷史，便知我民族非無血性、我歷史非無價值也。」<sup>36</sup>

小國越南竟然能打敗蒙古大軍，免受鐵蹄蹂躪，維護自權。黎愼藉由陳朝成功抗元之事蹟，再次肯認民族之歷史價值與存在意義，來回應外界對於越南民族「無血性」，越南歷史「無價值」的質疑。

又如黎愼在〈西山史論〉一文認為西山阮氏成功抗清，大敗當時的兩廣總督孫士毅（1720-1796），也同樣是越南歷史上的光榮時刻。後來「雖享國不久，然一時事業，赫赫在人耳目，為我歷史上最具有價值之時代」。<sup>37</sup>不過，在越南這段抗清退敵的歷史背後，卻也有著令人心痛悲憤的屈辱。歷史的弔詭莫過於此，侵略越南的清軍，竟是與西山阮氏相抗，為求復國復位的後黎朝黎昭統帝黎維祁（Lê Duy Kỳ, 1765-1793）向清朝請求來的。黎愼不僅歌頌到西山抗清的歷史成就，也特別留意黎維祁向清廷求援，卻困滯他鄉，在異國受辱的辛酸史。清朝雖出兵助其復位，卻心懷異志，黎維祁引狼入室的結果，便是成為毫無實權的傀儡君主。後來西山阮惠重整旗鼓，再次揮軍北上，一舉擊潰清軍，黎維祁亦倉促避往中國。他再次向清廷求援，卻遭當時的兩廣總督福康安（1754-1796）所拖延，並要求黎維祁君臣薙髮結辮易服，喬裝為華人，托言如此裝扮，回國後便不易為敵人所認出。黎氏君臣果真依言而行，詎料福康安卻上奏乾隆（1711-1799），謂其無意再請援兵，並已薙髮易服，願安居於中國，請聖上降旨罷兵。乾隆同意，日後更承認光中阮惠為安南國王，並將黎氏君臣安置於北京，以便就近管理。心有不甘，不願就此終老一生的黎氏君臣，希望透過鑲黃旗都統金簡（?-1794）的協助，求見乾隆。金簡表面答應，卻暗中與和坤（1750-1799）合謀分置安南君臣於各地，以分散其力量。黎維祁聞知此事，欲訴之金簡，金簡正好於圓明園朝見乾隆，黎

<sup>36</sup> 楚狂：〈陳朝平元之武功〉，頁 92。

<sup>37</sup> 楚狂：〈西山史論〉，《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93 期（1925 年 3 月），頁 41。

氏追至園門，為守門者所阻，黎氏馬僮阮文涓（?-1791）遂與守門者打鬥，後傷重病死。黎氏自此之後抑鬱悲憤，不言請兵之事，隔年（1792）五月又因其皇子患天花而卒，哀痛病倒，後薨於癸丑年（1793）十月。<sup>38</sup>

當黎愼至北京遊歷時，黎昭統帝黎維祁受辱中國的這一段歷史不斷地在他腦中閃現，他相當感慨地寫到：

讀我歷史述及燕京而生無窮悲痛者，為黎昭統君臣被分插於燕京一事，時帝與羣臣因黎祚式微，干戈四起，痛宗國之顛覆，恨薄力之難支，因奔播北來，求援于清，為清君臣賣弄，分插於燕京城內外，或為所欺、或為所脅，或幽獄於一室，或分配於遠方。萬里南瞻，悵江山之暗淡；千行雪涕，感身世之飄蓬。事勢到頭，補救無術，其後君則葬身異域，臣則客老他鄉，此末路此慘狀，猶令人於百年後為之表同情者，故一述及燕京，無不為之怦怦然有動於中者。余平生一涉足燕京，心中所感，不啻披閱黎季痛史一遍，壯懷鬱勃熱淚淋漓，幾欲鳴劍為古人斬不平事。<sup>39</sup>

一國君臣淪落他鄉、流離異地，不但復國無望，又受盡欺瞞脅迫，這不僅是黎維祁等人受辱的歷史，也是整個民族的悲痛史。黎愼承認當他回顧這段慘痛的歷史記憶，亦是悲憤填膺、怏怏不平。揭露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和恥辱，有助於族群認同與集體情感的鞏固和強化，其效果不下於回顧國族的光榮歷史。<sup>40</sup>這也是黎愼文史書寫中常見的一種論述手法，因此他欲於北京「城內外遍尋故黎出帝君臣旅居之遺址」，<sup>41</sup>不單單是為了「藉慰感懷」，亦有提醒國民外來者所給予的壓迫痛苦，

<sup>38</sup> 事件經過改寫自〔越〕陳重金（Trần Trọng Kim，或譯為陳仲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277-280。吳鈞：《越南歷史》（臺北：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年，再版），頁188-192。

<sup>39</sup> 楚狂：〈萬里遠征記〉，第89期（1924年11月），頁89。

<sup>40</sup> 對於群眾運動深有體會與研究的賀佛爾（Eric Hoffer，1902-1983），曾提到：「群眾運動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卻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運用和理解的一項，就是仇恨。」「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劑」。這也是許多群眾運動領袖，或是民族史書寫者常用的論述策略。引文見〔美〕賀佛爾（Eric Hoffer）著，梁永安譯：《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131、136。

<sup>41</sup> 黎愼曾尋訪幾處黎帝及皇太后的駐所（安南營），也述及阮文涓事跡，其云：「燕京名勝最多，而最有名者為頤和園，園在京城西直門外，圓明園之西，圓明園頹廢已久，然經

來鞏固自我的認同。可惜諸多遺跡已景物全非、湮沒不存，黎慎大多空手而歸。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探尋（甚至是一種親臨現場的田野調查）和書寫這段歷史記憶所喚起的強烈情感，他說：「（國子監）衙門昔為黎帝及皇太后之駐所，俗呼為西安南營，至但見周圍房室皆古時建築。頽垣碎瓦，半帶綠苔；朽棟殘簷，皆呈古色。而國子監亦已荒廢，唯有斜陽掩映及子規啼暮之聲，一若黎帝有靈，見記者從故國新來與之嘆息前事，伸當時壹鬱不平之氣也。」<sup>42</sup>與其說是黎帝有靈，更不如說是黎慎心中激起了強烈情感，是對越南更深厚的關愛之情，而這份抑鬱不平之氣，也將為後世的越南國民所同情共感。在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黎慎運用同一個歷史轉捩點，為分屬不同立場的西山阮惠及後黎朝黎維祁進行書寫，前者為越南排拒他者（清朝）的輝煌歷史，後者則為越南受制於他者的慘痛回憶，這些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歷史記憶，都能達到凝聚認同、醒覺國族的目的。

再回到我們所關注的，關於黎慎對於越南民族排外的光榮歷史的探討上。除了抵禦中國之外，越南人也曾成功地擊退海上的外患，根據黎慎的研究，1585年（日本天正十三年）「洋人號顯貴乘五大艘泊海劫掠」者，即日本人「白濱顯貴」，文中這位被稱為「西洋國賊帥」的白濱顯貴曾被阮福源（Nguyễn Phúc Nguyên, 1563-1635）所擊退，而獲得其父阮潢（Nguyễn Hoàng, 1525-1613）的讚許。黎慎認為此事代表越南「古時之武威，已發揚於海外，豈非歷史上之光榮耶」，<sup>43</sup>證明越南在東南亞海洋勢力的發展上已佔有一席之地。

---

此遺址不覺憶及阮文涓故事。文涓清華布衛人，為黎帝馬僮，當從亡諸臣被清人以牛車發配三百里外，黎帝甚為憤鬱，乘馬直入圓明園，欲訴於清都統金簡，蓋時簡方侍乾隆帝遊幸園中故也，入園門之頃，為守門者彊抑不准進內，文涓臥于地下，大呼：『吳子無禮，敢辱我君？』因以石擲打守門者。文涓角鬪受傷甚重，後遂病死，其骸骨後得與黎帝靈柩歸葬於清華礮石陵旁。余今過此猶想像如聞壯士之呼聲，徘徊不忍他去。因述與各華友聞之，人皆為之起敬。」從阮文涓所說的話，可見其相當鮮明的國族意識，彼此不相混淆的，也是不容蔑視的。引文見楚狂：〈萬里遠征記〉，第89期（1924年11月），頁90。

<sup>42</sup> 楚狂：〈萬里遠征記〉，第91期（1925年1月），頁13-14。「壹鬱」一詞，典出南朝梁·蕭統〈文選序〉：「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愜。」有抑鬱之意。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web.cgi>，檢索日期：2018年3月9日。

<sup>43</sup> 楚狂：〈古代南日交通考〉，頁201。

黎愷對於越南光榮時刻的追尋、展示與銘記，並非僅止於「自立自強，不為中國所併吞」的抵禦外患而已，亦在於對他國的吞併和領土的開拓，「又能以彈丸黑子之地，日闢百里，奄有數國，至今龐然為一大越南國」<sup>44</sup>，逐步成為傲視東南亞的強權。他在〈越南光榮之歷史〉一文中描述越南歷代政權逐步併吞占城和真臘的過程，他接著感嘆：「噫！偉哉！我越南不但不被併於北國又能吞併數國，以開拓疆土如此之廣且大，較與其他各國，歷史上之光榮為何如耶？迄今山河無恙，風景不殊，我後人安坐而享此為鴻業，得不思所以增榮耀之耶！」<sup>45</sup>他提出後世越南國民如何承續先民基業，再造輝煌的問題。他在同篇文章追述越南的「排外」精神時，曾寫下這樣的文字：

環亞洲而立國者大小凡數十，其間為中國所吞併者比比皆是。……越南與此雄且強之中國為鄰，而儼然獨存，不至為其所吞併，豈非一快事哉？……其面積不過中國之一省耳，雖或時被併於秦，或時被占領於趙尉，或敗於馬援，壓迫於元，郡縣於明，而卒能奮發自強，河山無恙，國土不至於淪夷，人民不至於牛馬。今履我國土者猶稱曰越南國。見我人民者猶曰越南民，果何所憑藉而致此，豈非我先民剛猛不屈之氣，百折不挫之志，愈奮愈勵，克自樹立而然耶！<sup>46</sup>（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劃）

黎愷提到越南過去雖然曾短暫地被外人佔領的，但總能克服民族的挫折與失意，奮然追求國家的獨立。越南人民所享有的一切，正來自於先民努力不懈、奮然自立的結果。黎愷在此不僅希望人們能回顧越南歷史上的輝煌，更期許國民能承繼先民奮發獨立的精神，再造新的令人光榮的「鴻業」。他試著幫助國人找回國族的自信、認同及尊嚴，對映於越南被法國殖民的現實處境，他對國家的期許與深摯感情不言可喻。或許是怕觸犯禁忌，黎愷話鋒一轉，在該文文末寫下：「況又得歐洲文明先進國之貴國為之指導，民智日以開通，文化日以發達，我越人師而事之，以求進步，則國家光榮之前途寧可量耶！我越人之勉乎哉！」<sup>47</sup>至此一變先前「抵殖民」的姿態，被殖民者民智之開通、文化之發展、前途之光榮，仍有待法人的

<sup>44</sup> 楚狂：〈越南光榮之歷史〉，《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58 期（1922 年 4 月），頁 120。

<sup>45</sup> 同前註，頁 121。

<sup>46</sup> 同前註，頁 120。

<sup>47</sup> 同前註，頁 121。



指導。由此可見，黎愼在面對不同政治立場時，他所做出的調整，或許是一種不得不然的自我保護。但即使是曲終變奏，我們仍可見到他那背後幽微卻又熾烈的情感與心聲。

## 五、結語

1923年1月，黎愼與日本友人高橋、牧野二君一同遊歷由安陽王（An Dương Vương，生卒年不詳）所構築的古螺城（Thành Cổ Loa），他在〈遊古螺城記所感〉一文中寫下他觀覽古城後的心情：

牧野、高橋二君以我越古辰代已有此等雄偉建築，不覺讚嘆不置，遍覓諸古樹頽垣下，冀拾得一古物以為此行之紀念，其好奇心有如此。余則獨自低迴，若有不勝情者，念桑滄變易，乃天演不可逃之公例。無論安陽王當年事業，無有復存者，即至最近如陳黎歷代，亦均伯圖灰燼，王氣消沉，其可以供吾人憑弔者，只此一種斷瓦頽垣耳。俯仰今古，則今觀此山河、此風景、此城郭、此人民，亦何暇謂昔人惆悵哉？<sup>48</sup>

黎愼曾錄下古螺城安陽王廟廟門上方所題之「俯仰千古」的字樣（如下圖四），這四字意謂安陽王的功勳，以及他所規劃構築的螺城，在歷史的長河裡足為典範，永不磨滅，其功業也獲得同行日本友人的讚嘆。不過，黎愼在追撫山河舊跡、俯仰今古興亡之際，反而陷入一種深沉複雜的愁緒之中。越南歷代均有光榮輝煌的成就，但這些歷史榮光似乎逃不過時間的淘洗，以及優勝劣敗的天演規律。山河景色或許無異，但國家的衰微淪亡卻不易挽救。光榮傳統與現實處境所形成的反差，更令人感到惆悵悲涼。由此觸緒生慨，足見黎愼民族情感之真摯深厚，其對越南國家處境的憂慮和省思，絲毫不遜於反法殖民運動者，我們顯然不能用傳統「效忠」與否的二元觀點來看待他。

藉由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黎愼對於越南民族在殖民處境下的衰弱與危機，再三致意，多次表達他深層的焦慮和關心。雖然某些篇章宣揚了殖民者的政績與美好形象，但他更著眼於國民性的不足，以及被殖民的難堪處境。若再進一

<sup>48</sup> 楚狂：〈遊古螺城記所感〉，《南風雜誌》漢文版，第68期（1923年2月），頁32。

步觀察他的文史書寫，便能了解他同時也積極地召喚、展示越南歷史的光榮時刻，以喚醒越南人民的民族自信和國家認同，這些手法都成為他重要的書寫策略。黎愼這套打造「排外」論述，以面對「他者」的民族史學書寫，其實與潘佩珠極力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極為相似，都是希望能藉此醒覺國人、凝聚族群，以追尋自我的主體性。<sup>49</sup>我們也可藉此思考這類經歷不同立場、陣營之選擇的知識人，在其書寫背後更複雜多元的情感意圖和行動抉擇。



圖 4、古螺城安陽王廟廟門，及門額上的「俯仰千古」字樣（筆者攝）

黎愼的文史書寫除了飽含愛深責切的民族情感之外，他也努力挖掘越南文史中隱而不顯，或是被抹除消音的歷史角落與邊緣人物，從而思考在政治抉擇與文化認同上的正偽之辨、出處之間等關鍵問題。而他同時留心於在東亞區域考察時的現代性體驗，並在感受彼此的差異之中，思考自我認同與國家處境。因此，在真相考掘、重建傳統、殖民處境與意識型態等多力互動共構之下，黎愼如何進行顯、隱、去、取之間的認同或抉擇，其間複雜多元的面貌，將是筆者未來持續探索的課題。

<sup>49</sup> 詳見羅景文：〈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頁 159-186。

## 徵引書目

- 吳 鈞：《越南歷史》，臺北：自由僑聲雜誌社，1998年，再版。
- 陳荊和：〈戰時的法國遠東學院〉，《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3期，1949年5月，第4版（原頁碼標示如此）。
- 陳瑋芬：〈金永鍵之日本與東南亞交流史論——《印度支那與日本的關係》述評〉收入於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越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2015年，頁179-235。
- 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收入於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9冊，上海：上海古出版社，2010年。
- 羅景文：〈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成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2年6月，頁159-186。
- Clémentin-Ojha, Catherine. Manguin, Pierre-Yves.: *A Century in Asia : The History of the 'Ecole Française 'Extrême-Orient, 1898-2006*, Singapore :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7.
- Philippe Le Failler : *Viện Viễn Đông Bác Cổ Pháp tại Việt Nam, 1900-2000: Nhìn Lại Một Thế Kỷ Nghiên Cứu Khoa Học* (《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 1900-2000：回顧一世紀來的科學研究》)，河內：文化通信出版社，2000年。
- Marr, David G.,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越南反殖民主義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年。
- 〔美〕賀佛爾（Eric Hoffer）著，梁永安譯：《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
- 〔韓〕尹大榮著，李美智譯：〈1930-40年代の金永鍵とベトナム研究〉，《東南アジア研究》第48卷第3號，2010年12月，頁314-333。
- 〔韓〕金永鍵：〈安南の史料に現れたる顯貴の名に就いて〉，收入於氏著：《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關係》，東京：富山房，1943年，頁255-262。
- 〔越〕陳重金（Trần Trọng Kim，或譯為陳仲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越〕楚狂 (Sở Cuồng) : 〈古代南日交通考〉,《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54 期,1921 年 12 月,頁 200-213。

\_\_\_\_\_ : 〈越南光榮之歷史〉,《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58 期,1922 年 4 月,頁 120-121。

\_\_\_\_\_ : 〈對於越南青年會之感想〉,《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63 期,1922 年 9 月,頁 63-65。

\_\_\_\_\_ : 〈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67 期,1923 年 1 月,頁 1-8。

\_\_\_\_\_ : 〈遊古螺城記所感〉,《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68 期,1923 年 2 月,頁 32-35。

\_\_\_\_\_ : 〈孟子學說〉,《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76 期,1923 年 10 月,頁 61-65。

\_\_\_\_\_ : 〈萬里遠征記〉,《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4 期,1924 年 6 月,頁 108-112。

\_\_\_\_\_ : 〈本朝前代與明末義士關係之逸事〉,《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1 期,1924 年 3 月,頁 47-49。

\_\_\_\_\_ : 〈編輯中有感〉,《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4 期,1924 年 6 月,頁 98-101。

\_\_\_\_\_ : 〈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8 期,1924 年 10 月,頁 61-64。

\_\_\_\_\_ : 〈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 (續)〉,《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89 期,1924 年 11 月,頁 85-87。

\_\_\_\_\_ : 〈西山史論〉,《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93 期,1925 年 3 月,頁 41-56。

\_\_\_\_\_ : 〈陳朝平元之武功〉,《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96 期,1925 年 6 月,頁 87-92。

\_\_\_\_\_ : 〈明末義士魏九官逸事之研究〉,《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96 期,1925 年 6 月,頁 92-93。

\_\_\_\_\_ : 〈陳黎演義〉,《南風雜誌》漢文版,第 98 期,1925 年 8 月,頁 19-27。

\_\_\_\_\_ : 〈草澤英雄〉 (“Thảo Trạch Anh Hùng”),《南風雜誌》越文版,第 163 期,1931 年 6 月,頁 530-537。

〔越〕潘佩珠 (Phan Bội Châu) : 〈潘佩珠年表〉 (*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 收入於〔越〕章收 (Chương Thâu) 編輯:《潘佩珠全集》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第 6 冊,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 年。

〔越〕吳世隆 (Ngô Thế Long), 陳太平 (Trần Thái Bình) : 《遠東博古學院

- (1898-1957)》(*Học Viện Viễn Đông Bác Cổ (Giai đoạn 1898-1957)*)，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越]阮氏鶯(Nguyễn Thị Oanh)：〈越日外交關係を古書籍に探る〉，收入於劉建輝編：《日越交流における歴史、社会、文化の諸課題》，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5年，頁25-44。
- [越]段黎江，黎光長(Đoàn Lê Giang, Lê Quang Trường)：〈楚狂黎愷：研究日關係的先鋒者〉(“Sở Cường Lê Dư - Học Giả Tiên Phong trong Việc Nghiên Cứu Quan Hệ Việt Nam-Nhật Bản”)，越南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Tạp Chí Văn Học*)第7期，2014年，頁66-78。
- [越]段黎江：〈《外蕃通書》：越日關係的古代史料〉(“Ngoại Phiên Thông Thư: Tập Tư Liệu Cổ về Quan Hệ Việt Nam-Nhật Bản”)，《科學和工藝發展雜誌》(*Tạp Chí Phát Triển Khoa Học và Công Nghệ*)第17卷第12期，2014年，頁112-125。
- [越]瓠園(Hồ Viên)：〈前言〉，收入於楚狂黎愷著、瓠園譯注：《昇龍印痕：河城今昔考》(*Dấu Tích Thăng Long: Hà Thành Kim Tích Khảo*)，河內：勞動出版社，2007年，頁5-10。
- [越]胡雙(Hồ Song)：〈《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對越南史學的貢獻〉(“Việt Nam Quốc Sử Khảo: Một Đóng Góp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ào Nền Sử Học Việt Nam”)，收入於章收編輯：《潘佩珠全集》第3冊，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年，頁11-20。
- [越]陳孟常(Trần Mạnh Thường)：〈黎愷〉，收入於氏著：《越南文學作家》(*Các Tác Giả Văn Chương Việt Nam*)第1冊，河內：洪德出版社，2015年，頁877-878。
- [越]陳海燕(Trần Hải Yến)：〈黎愷〉，收入於[越]杜德曉(Đỗ Đức Hiếu)、阮慧芝(Nguyễn Huệ Chi)等主編：《文學辭典》(*Từ Điển Văn Học*)，河內：地球出版社，2004年，頁818-819。

# Nationalism of “love well, whip well”: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Nam Phong Tap Chí* Written by Lê Dư,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uo, Ching-wen\*

[Abstract]

Lê Dư (1885?-1957), also known as Sở Cường, had very unique experience among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e shared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ith those who were against European colonizers, but later became active in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rench colonial, and hence Vietnamese government and the typical narratives often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He had traveled across China, Jap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his had gained meaningful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Lê Dư preferred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rea studies compared to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became a journal editor for *Nam Phong Tap Chí* (Chinese version) after returning from abroad. He had also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in various journals. In 1924, Lê Dư joined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and launched the Vietnamese cultural study. Lê Dư made every effort to dig into those invisible or erased historical corner and borderline characters in the Vietnam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e profound nationalism in his historical literature is not inferior to the anti-French colonialism. Obviously, people cannot judge him by the loyal dualism traditionally. Instead, we can rethink the complex diversity of expressiv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decision behind this type of documentation that recorded by the intellectuals who experienced the varied perspective from others.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eywords:**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Lê Dư, Sở Cường, *Nam Phong Tạp Chí*

